

回音阁

文 / 董邦耀

命脉上的民族脊梁

评抗战时期陕西公路运输的历史叙事与精神传承

在历史的长河中,某些特定时空下的物质存在往往能够超越其物理属性,升华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与精神的载体。郭少言《国之命脉:抗战时期的陕西公路运输》一文,正是通过对抗战时期陕西公路运输系统的全景式描绘,将那些蜿蜒于黄土高原与秦岭山脉间的公路,从单纯的地理通道提升为民族存亡关头的精神图腾。这篇三千余字的急就章,却以其“全面、准确,有略有详,脉络清晰,首尾呼应”的特质,完成了一次对历史记忆的抢救性打捞,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那段艰苦卓绝岁月中,交通网络如何成为支撑一个民族不屈脊梁的“国之命脉”。

说其是急就章,是因为郭少言八月在《陕西交通·月末版》给印刷厂交版的当天中午,向我这个干过陕西交通编史的人咨询过几个历史数据,说是因版面需要,正在赶写一篇抗战时期陕西公路运输的稿子里用。我才知道留给她写稿的时间不多,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3000多字的稿子,已经不易,见报后的稿子又是那么气度不凡,更是让人惊叹不已!

抗战时期的陕西公路运输史,本质上是一部国家意志与民间力量在危难时刻相互交融的壮丽史诗。文章清晰展现了这一双重叙事: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布局,“全省汽车总队部”的成立、对军公商车辆的军事统制、凭证行驶制度的实施,体现了战时高度集中的资源调配模式;另一方面则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迸发,商车编入征车队、“在天津贴,无运费的情况下”默默承担军运重任,边区群众“就地取材,因陋就简”修建道路,各种代燃汽车的推广使用。这种上下互动的运输体系,不仅解决了战时运力极度紧张的困境,更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展现出的惊人创造力与牺牲精神。

陕西公路运输在抗战中的特殊性在于其承担了多重历史使命,既是物资通道,也是文化走廊,更是精神象征。作为“西北国际生命线”,它承接苏联援华物资,转运我国出口物资;作为文化迁徙之路,它护送故宫国宝南迁,保障高校师生西迁,“古路坝灯火”在公路上延续着中华文脉;作为民族精神之路,它护送成吉思汗灵柩,守护的不仅是一具灵柩,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尊严。这些多元功能的交织,使陕西公路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运输范畴,成为战时中国的血脉网络,连接着前线与后方,国内与国外,物质与精神。

面对“配件短缺、敌机轰炸,使得运力极度紧张”的困境,陕西公路运输展现了中国式的战时智慧与适应性创新。文章详细记述了各种应对措施:从技术层面的“苏制汽油车改为木炭车”、推广酒精代燃汽车,到组织层面的动员一切民间运输工具、举办骡马运输;从国际通道的保密措施(称“羊毛运输”),到特殊运输任务的军事化编制(如故宫文物迁移)。这些应对策略既有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也有自下而上的民间创造,共同构成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战情的交通运输体系。这种在极端困境中迸发的实践智慧,不仅保障了战时运输任务的完成,更体现了中华民族在面对挑战时的灵活性与韧性。

文章虽然讲的是历史,却让我们对公路有了全新的理解。在这些叙事中,公路不再是冰冷的地理概念,而是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生命线”象征着生存的希望,“文化长征路”象征着文明的不灭,“国际通道”象征着与国际社会的连接。这些符号共同构建了抗战公路的神圣性,使其成为民族精神的地理载体。特别是文中提到的“无一箱损毁”的文物运输,“彻夜苦读”的师生迁徙、“盛大典礼”的成陵迁移,这些细节已然超越了单纯的历史记录,升华为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性表达。

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今天,回望那段公路运输史,我们不禁要思考历史书写与现实观照之间的辩证关系。此文虽然是对过去的重述,但其价值却指向现在与未来。当年“天堑变通途”的公路建设,如今已发展为“高速公路、高铁、航空网络”,但那种“在战时承载了难以想象的重量”的公路精神,是否仍在延续?文章提醒我们,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精神的传承不仅需要记忆,更需要实体的物质载体。

从文学叙事的角度看,文章虽然是在仓促间完成的历史叙述,却因其选题的历史深度和细节的真实性,获得了超越文本的文学价值。文章通过具体的数据(“300余车次,历时50余天”),生动的场景(“翻越秦岭,无一箱损毁”)、典型的人物(总工程师赵祖康的回忆)和重要的事件(文物西迁、高校南迁、成陵迁移),构建了一个立体而真实的历史时空。这种基于事实的文学性叙事,比任何虚构作品都更具震撼力,也让那些默默无闻的筑路者、驾驶员、养护工得以进入历史的前台,获得应有的历史地位。

《国之命脉》一文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揭示了公路运输中体现的民族精神——那种在极端困境中依然坚持的韧性,在资源匮乏中依然迸发的创造力,在危险重重中依然坚守的责任感。这些精神品质不仅属于那个特定时代,更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当我们今天飞驰在陕西的高速公路上,或许很难想象当年在秦岭山脉中“曲折盘旋”的艰难行程,但正是那些“看似简陋的公路”,在那个危难时刻“支撑起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尊严”。

此文作为一篇“刀笔快手”的急就章,或许在文学修辞上还有精雕细琢的空间,但其对历史事实的准确把握,对运输脉络的清晰梳理,以及对那种公路精神的敏锐捕捉,已经使这篇文章超越了简单的历史追述,成为一部浓缩的抗战交通史,一首献给所有“为民族生存而筑路、护路、行路的人们”的散文诗。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今天,这样的历史重述不仅是对过去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启示——一个民族的命脉,不仅在于有形的道路网络,更在于那种无形的精神传承。

我在心里爱着你

—— 写给英雄的抗战老兵

文 / 梁子

带着一道浓郁的风景,你啊,来到了阅兵场。赫赫华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卓然挺起民族脊梁的抗日英雄,世人难忘!你是一位抗战的老兵,已是,高龄鹤发沧桑。峨峨中国人民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里,你那可敬可叹的故事,令人敬仰!

八十年前的岁月里,你们情赴国难,告别爹娘,以血肉之躯抗击倭寇烧杀虏掠的疯狂;

八十年前的抗战中,你们不忍国殇,横刀立马,用一腔鲜血宣示龙的传人不屈的情商。

多少次枪林弹雨的鏖战啊,你们身经会战,血洒疆场;多少次冲锋陷阵的搏杀中,你们打完子弹,刺刀闪亮;多少次粉碎日本鬼子的扫荡,你们杀敌在敌占区;多少次解救受苦受难的百姓,你们活跃在青纱帐。

说也说不清,打过多少仗;数也数不清,身上

几处伤。忘也忘不了,身边的战友牺牲了,眼睛中闪烁仇恨的火焰;放也放不下,多少年已经走远了,怀念战友的英魂月下心伤。一次次会战,都是用鲜血大写的历史。一回回抗争,载入华夏子孙历历的过往。

灾难深重的土地上,多么需要有人凛然大义扛起枪,用一腔的生命之火,让侵略者跪地投降。

飞扬军魂的阅兵中,多么期待健硕的你再来到现场,用心中不老的魂魄,灿烂闪烁胜利之光。

真的要谢谢你,抗战中的老兵!有你们这样的斗士仁人,是国之大幸,民之所望。卓然挺立的,是民族的脊梁;

在心里爱你啊,抗战中的老兵!祝福可敬可爱的耄耋老人,益寿延年,幸福安康,在中国梦的长河中,心驰神往:……

碑石上的年轮

—— 献给未曾远去的1937

文 / 薛政春

永定河仍在替岁月磨刀
月光卡在卢沟桥石狮的齿缝
1937年的那枚残月
被枪声吹出豁口
碎成千万片带血的瓷
再也拼不回一缕完整的炊烟

地道里的油灯始终醒着
数过庄稼汉磨亮的锄头
数过姑娘粗布衫上的补丁
她把传单折成纸船
顺涇阳河流向战火深处
河面忽明忽暗——
纸船与炮弹同时绽开
像两重对峙的星群

滇缅公路把石子拧成绳索
勒进十万双皴裂的掌纹
掌纹里缠着母亲临别的线头
夹着女学生剪落的襟梢
烙着华侨捐款的银元

在海拔三千米处
被高温锻成桥梁的钢骨

南京城的梧桐学会了沉默
每年落叶,都以俯冲的姿态
拂过三十万双未阖的眼睛
它们曾盛满紫藤、糖人、巷口的炊烟
最后盛满冰凉的江水
江底压着未写完的家书:
“要活着,要记住”
墨迹至今未散

纪念碑的基座长满青苔
却磨不钝那些名字的棱角
我们摸到赵尚志的枪托残雪
摸到杨靖宇胃里未化的棉絮
摸到八女投江时飘展的裙摆
摸到张自忠凝固的血迹
每一次触碰
指尖都迸出一粒星火



文 / 刘骥良

定风波·观九三阅兵

猎猎旌旗映碧空,三军将士气如虹。
铁骑骎骎惊天地,威武,雄师劲旅展豪雄。

遥想当年烽火起,铭记,先驱热血染征蓬。
今日阅兵逢盛世,承志,强军路上建新功。

(作者系咸阳公路局退休职工)

如今的孩子在课本里与他们相遇
遇见泛黄照片上年轻的眉眼
遇见“汉奸”二字时攥紧的拳头
遇见“胜利”时
瞳孔里突然亮起的灯火
拂过当年地道里的油灯彼此映照
也与滇缅公路上的车灯遥相呼应
像一条永不中断的血脉

我们把种子埋进春天
在平型关的山坡种油松
让树尖永远挺着冲锋的姿势
在台儿庄的田野插秧秧
让耒耜低垂装满思念
在重庆防空洞的旧址开书店
把《论持久战》放在最明亮的橱窗
任阳光在封面上
织就一片金色的经纬

爱国是祖传的手艺
是祖父怀表里停驻在“九·三”的指针

是父亲教我的第一句歌词
——“起来”二字一出口
声带就磨出山河的分量
是我给女儿系红领巾时
指腹触过国旗一角的温度
那温度里有烽火淬炼的钢
也有永不褪色的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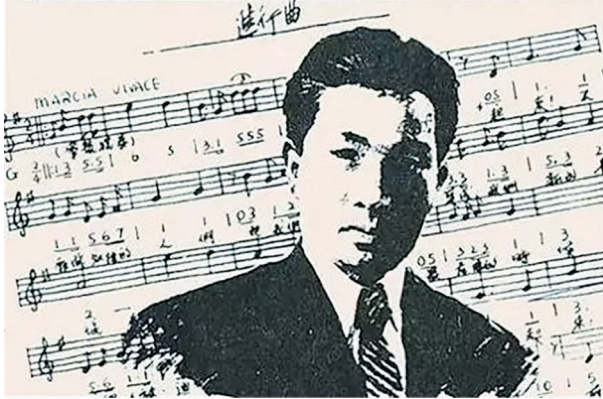
永定河仍在流
载着新时代的船
船头年轻的舵手
望见两岸高楼如新生的碑林
麦浪似大地上温柔的纪念
他知道龙骨深处
嵌着千万个发光的名字
他们早已长成共和国的年轮
一圈,又一圈
把和平环抱进现实
将记忆守成永不沉睡的烽火台

(作者供职于韩城市公路局)

风华录

探访聂耳故居

文 / 刘贵成



8月的一个清晨,时值《国歌》诞生90周年,我怀着肃穆的敬意,踏上玉溪市红塔区北门街3号的青石板路,推开了《义勇军进行曲》曲作者聂耳故居的院门。

院落中,一幢清末所建的青瓦木梁二层小楼静静伫立。这栋由聂耳曾祖父始建、传至其父的老宅,仍保留着岁月的痕迹。一口古井映照云天,一排药柜散发草木馨香,一架旧柴灶留有烟火痕迹,几张老木床承载岁月温度——百年前的生活气息,仿佛正从这些物件中缓缓溢出。

聂耳的父亲是当地中医,原配病逝后,与一位傣族女子再婚,这便是聂耳的生母。作为家中幼子,聂耳虽生于昆明,却常于少年时随母亲回玉溪省亲。就是在这方小院子里,他写下21篇日记。在昏黄油灯的光晕中,“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于少年心中悄然生根。而玉溪滇剧的婉转唱腔、母亲吟唱的傣族民歌与花灯小调,如春雨润物,成为他最早的音乐启蒙。

聂耳自幼展露出卓越的音乐天赋。他不爱学业优秀,还积极参与音乐活动,自学小号、三弦、二胡、小提琴等多种乐器,成为学校的文艺骨干,深受师生推崇,这也为他日后的音乐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岁月笔记本

手表

文 / 祁阿辉

摩挲着这块崭新的手表,贴在耳朵边仔细听了听表针的走动声,连连称赞好看,又递给小叔,嘱咐小叔戴好。父亲问小叔买表花了多少钱?小叔回答说120元,托人从上海买的。父亲说上海牌手表还是略差着好,让小叔婚前再不要置办这么贵的东西了,好好攒钱娶媳妇,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小叔点头称是。

小叔走后那几天,父亲母亲除了念叨小叔找对象一事外,谈论最多的就是小叔的上海牌手表。那个年代,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是每个成年男女迈向高品质生活的标志。

母亲每天上班戴的是一块蝴蝶牌手表,西安产的。蝴蝶牌手表曾是西北地区的名牌手表,当然比起上海牌手表还是略逊一筹。父亲也有一块手表,是个杂牌子,已经戴了好些年,还是当初和母亲结婚时祖父送给他的。

父亲母亲都是普通干部,工资不高,要养活我们兄妹三人,还要贴补老家亲友,日子过得拮据。好在父母精打细算,

总能隔段时间就给家里添置一两件好东西,譬如父亲最喜爱的红灯牌收音机,母亲心心念念的标准牌缝纫机。父亲爱学习,动手能力强,自己给亲友安装了好几台半导体收音机,还用贝壳给家里做了漂亮的台灯,甚至自己动手制作了家中的第一对单人沙发。当沙发做成时,父亲那枚经常出问题的手表问题越发严重了,表针经常说停就停,总耽误事。终于,父亲下决心一咬牙买了块上海牌手表,是当时的最新款,秒针上戴着红箭头。父亲每天下班回来,摘下表用一块干净的白布仔细擦拭后放好。一次突降暴雨,父亲恰好骑着自行车在外头,浑身淋了个湿透,回家后发现表停了。父亲十分心焦,顾不上吃饭,把手表包在卫生纸里吸潮气,半夜又爬起来用干布包了手表。第二天又放在窗台上晾了半天。第三天,红箭头表针又重新走了起来,父亲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小叔后来和他的高中女同学结了婚,有一年来家看望父亲,吃饭时小婶子的

手腕上戴着一只小金表,十分抢眼。母亲留意到表上有个皇冠造型,不晓得是啥牌子,又不好意思问。后来母亲单位一位时髦的女同事也戴了一块和小婶子手腕上一模一样的手表,母亲问过才知道是天王表,又问了价格,下一惊。后来单位新来的年轻人戴的手表牌子好多都是母亲从未听说过的,有的还是进口牌子,母亲不禁感慨起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风尚的变化。

母亲单位去南方出差的同事不断从广州、深圳等地捎回样式新颖、价钱便宜的电子表,有日本产的,更多是南方地区一些小厂子产的。很快母亲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块电子表,再后来,全家每人一块。我戴手表的习惯自此养成。

之后机械表和石英表又重新兴起,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先后购买过几款价格相对便宜的石英表。再后来,喜欢上机械表,偏爱样式简单的一类。因为喜欢手表,连演员乔治·克鲁尼和妮可·基德曼做的手表广告也喜欢看。虽然随着手机的出现和普及,令手表的走时功能不再突出,但手表对我而言,比手镯和手链的吸引力更强,几乎每天都戴,否则总感觉少一样东西。现在经常戴的是十几年前买的一块女式石英表,轻巧秀气,银白色的金属表带虽已有磨损,却在不经意间有了历经岁月的沧桑感,这和我年纪相配。(作者供职于省公路局)